

臺北女子高等學院

文·圖片提供／洪郁如（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）



▲臺北女子高等學院住宿學寮的女學生與寮母高橋鏡子（前列右一戴帽者），1931年。（圖片提供／邱金蓮）

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設立於1931年，是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。校址即現在的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。該校常被戲稱「新娘學校」，但觀其歷史，這個定位無疑是殖民地外在環境折衝的產物，事實上殖民地當局、臺日家長與學生們，對該校各抱持不同的態度。

1920年代後半的臺灣，由於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持續增加，島內缺乏升學管道，以在臺日本人為主體，開始積極爭取設置女子專門學校。戰前日本高等教育體制下，專門學校是制度上提供女性升學的唯一管道。但總督府對開設公立女專所需負擔的龐大教育預算頗有難色，因而遲無進展。1930年設校請願運動進入高潮，為安撫在臺日本人的情緒，最後採取「私立官營」的方式，由總督府外圍組織的臺灣教育會出面經營，減低官方負擔，又可直接管轄。

然而政治折衝下誕生的該校，其制度設計顯然無法滿足民間期待。第一，臺北女子高等學院並不是依據專門學校令所設置的女子專門學校，而屬政府認可的私立「各種學校」範疇。女子專門學校一般為3到4年制，但該校修業年限僅2年。第二，內地私立女子專門學校一般獲政府認定，畢業生無須考試可自動取得中等學校任教資格。由於該校並非專門學校，畢業生自然與此無緣。也因此該校從創設到結束，升格專門學校的訴願始終不斷。

較之日人社會，臺人顯得並不積極。究其原因，其一，是普及初等教育，增加臺人就讀的中等學校數量與名額，更是臺人教育的當務之急。其二，中等學校教師資格的吸引力不大，臺灣中等女校校數極少，職缺有限，師資多直接由內地補充，錄用以日人優先，對殖民地就業市場的不



▲入學考試准考證（1931年）。（圖片提供／邱金蓮）

平等結構原本就不抱期待。其三，對不捨女兒遠行而使入學的臺人家長而言，該校作為島內女子最高學府，已具備有別於高女畢業生的學歷價值。

創校之初，由總督府文教局長杉

本良兼任校長，教員全由臺北帝國大學、高等學校等校教師兼任。第一屆新生合計97名，臺北第一高女畢業生最多，高達46%；學生多為日本人，臺灣人本科生18名，旁聽生2名，僅占20.6%。1932年入學人數驟減為50人，1934年竟僅有10幾名入學。原因在於前後幾任校長與教育當局的發言，陸續標榜該校培養「高等新娘」，家長判斷升格並不樂觀，導致招生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。

該校必修科目有普通科的修身、體操、教育、國語、歷史公民科、外國事情，與實科的裁縫手藝、家事。選修可在普通科的心理、哲學、心理衛生、英語、美學及美術史、自然科學、社會學之中任選一科以上，實科的音樂、繪畫、插花、茶道、園藝中任選兩科以上。內容特徵有二：第一，偏重家政學。兩年必修86時數中，手藝與家事高占40多小時，與知識教養學科不相上下；並特別重視家事之科學化、專門化與效率化。第二，自由校風與獨立思考教育。畢業生多指出該校教育比起高女活潑而無壓迫感，認為與兼任該校的帝大教師陣容重視理論思考有關。比如積極培養學生閱讀報紙政治、經濟版面的



▲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料理實習，1936年。（圖片提供／姜蕙英）

返臺就讀的例子。1944年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正式廢校，由國庫補助，在原校舍重新開辦私立女子專門學校。原因是男性教員紛紛被徵召離職後，高等女學校等中等女校教職出現大量空缺，加上連結臺日兩地的交通線日危，這些空缺無法繼續依賴內地遞補，急需自行培養島內女性師資。該校長久以來的升格期待，恰與戰時的國家需求一致，才得以實現。然而空襲頻頻，學校已經難以維持正常運作，預定招收文科理科各40名新生，結果文科僅4人，理科亦僅8、9人入學。

就教育當局而言，該校知識能力培養的目的，並不出塑造上層家庭「賢妻良母」的範疇。但畢業生們的經歷與回顧顯示，在往後人生過程中，她們許多在家庭角色外，積極將習得的智識技能轉化成個人發展與自我實踐的有利條件。如從事文學活動的楊千鶴與杜潘芳格，曾接受鄉原古統指導；終生投注繪畫的周紅綢、邱金蓮、彭榮妹、陳惠等氏；而李登輝夫人曾文惠亦為該校校友。即使該校始終被預設在「新娘學校」等傳統框架中，但畢業生們的實踐遠超過這個刻板形象，在近現代臺灣史上有其獨特的文化與社會意義。☒

能力，分析電影教材等。

1940年以後，戰爭為該校帶來招生景氣。戰爭時局逐漸緊迫，放棄遠行內地，選擇該校的臺人家庭越來越多，甚至出現了中斷原本內地學業，